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九

关中商代文化研究

张天恩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责任校对 周兰英
责任印制 陆 联
责任编辑 段书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关中商代文化研究/张天恩著. -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4.12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ISBN 7-5010-1684-4

I. 关… II. 张… III. 商文化(考古学)-研究-陕
西省 IV. K87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5910 号

关 中 商 代 文 化 研 究

张天恩 著

*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尚艺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787×1092 1/16 印张: 23.25 插页: 4

2004 年 12 月第一版 200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684-4/K·879 定价: 120 元

**本书的出版得到
“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
经费资助**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伯谦

副主任：王天有 王邦维 程郁缀 郭之虞

徐天进 赵化成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世长 王天有 王邦维 李伯谦

严文明 宋豫秦 何芳川 赵化成

赵 辉 拱玉书 高崇文 郭之虞

徐天进（常务） 夏正楷 程郁缀

序

邹 衡

陕西关中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几乎是其他任何地区都无法替代的。周、秦、汉、唐几个辉煌王朝先后在这里演绎了他们的光辉历史，将中国古代文明推向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称道和赞叹。但由于史乘不详，对于西周以前关中的历史记载几近空白，这里何以成为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一直是人们关心、思考但却费解的历史难题。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使过去许多无法认识的问题有了显著的突破，同时也为解决这一难题带来了希望。

张天恩同志长期在陕西从事新石器时代和商周考古工作，具备了扎实的研究基础。他的《关中商代文化研究》一书，就是立足于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关中及相关地区考古发现的资料，分析指出了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具有多姿多彩、异常复杂的特点，他的研究有助于对此问题的深入认识。

考古发现确实表明在西周以前关中地区既有来自中原地区的商文化，也有可能属于土著性质的先周文化，还有与古羌族有关的刘家文化，以及碾子坡文化等。

他的研究认为关中的商文化存在有地区差别，以泾河下游至西安一线为界，大体可分为东西两区。关中西部商文化的分布范围东起西安，西至周原。这类文化的产生之初虽以商文化为主，但也含有先周文化，以及少量刘家、朱开沟等当地和周围地区的文化因素，显示了多种文化混合的特点，与中原及关中东部的典型或较典型的商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别，故称其为“京当型”商文化是较为适宜的。这类文化遗存约从二里冈上层时期起进入关中西部的偏东地区，持续发展到殷墟文化第二期逐渐退出。

京当型商文化早期就含有先周文化因素的事实，说明了后者在此时已经出现，从而以比较可靠的证据把先周文化部分遗存的年代上限，提早到了二里冈上层时期。这不仅有助于解决争论多年的先周文化的年代问题，并为进一步探索其文化来源等重要问题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京当型商文化中所含的刘家、碾子坡以及北方甚至陕南地区的文化因素，说明其与这些文化也有程度不同的交流和联系。

对关中东部商文化的研究表明，商王朝是在成汤摧毁了夏桀的残暴统治之后，就立即挥师关中，直至西安附近。此后，关中东部就纳入了“二里冈型”商文化的势力范围。商文化不仅在整個早商时期实施着对关中东部的有效控制，并以此为依托在二里冈

上层时期进行了又一轮的扩张,把势力伸展到关中西部的偏东地区,形成了京当型商文化,并在后来分化出了关中东部的晚商文化“北村型”和“老牛坡型”。

他研究认为,以漆水下游郑家坡遗址和泾水中游孙家遗址为代表的商代文化遗存就是先周文化。由于分布区域的地理环境、文化面貌等方面的一些差异,先周文化早期被分为“郑家坡型”和“孙家型”。孙家型分为前后两段,前段约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或略早,后段可能与殷墟二期相当。郑家坡型从二里冈上层时期延续到殷墟三期与孙家型汇合,在泾渭地区迅速扩张,最终成为西周文化来源的主体。

先周文化曾与京当型商文化、刘家及碾子坡等渊源不同、相对独立的文化相邻而处,相互之间均存在过程度不同的联系和影响,尤以京当型商文化对其影响最为深刻。先周的青铜文化,应是接受了京当型的影响、刺激而发展起来的。而与古羌族有关的刘家文化,几乎是自觉地融入晚期的先周文化之中。研究还显示北方地区的朱开沟文化,及汉中盆地的宝山文化等在不同阶段与先周文化也有一些联系。较晚的断泾二期和黑豆嘴类型等与北方文化有关的遗存,约在殷墟三期占据了先周文化孙家型的分布区,颇有可能与周太王为戎狄所迫迁于岐下相关。

先周文化的来源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难题之一。他指出关中西部相当于夏代中晚期或略晚的“望鲁台—乔家堡”类型的联裆鬲、折肩罐、花边口沿等许多文化因素被先周文化所继承,故其可能是后者的主要来源,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认识。

现已知道商王朝的疆域可以到达关中西部的偏东地区。除了商文化和先周文化之外,分布于该地区的还有刘家文化和碾子坡文化。从文化发展的脉络、特征、活动范围,及其与商文化和先周文化的关系方面考察,其应该就是商时期与羌人有关的考古学文化。而在关中边缘或更远的寺洼文化等,大体也属于羌文化的系统。

他以较充分的资料论证了约从二里冈上层时期或更早阶段,刘家文化出现于陕甘相邻地区,后与京当型商文化在关中西部有一个较长的相持阶段,在殷墟二期的晚段曾一度占据了周原,但在殷墟三期以后就与先周文化融合,约在殷墟四期,真正意义上的刘家文化已不复存在了,而成为晚期先周文化的一部分。刘家文化的来源则可能与分布于葫芦河流域及附近地区的刘堡坪类型、渭河上游至兰州左近的董家台类型及青海东部的山家头类型有关。但其青铜文化因素,除了少量显示出自身的特点外,主要则是对商文化的吸收和继承。与古羌人有关的刘家文化与京当型商文化长期相邻而处,文化势力和分布区域互有进退,时代亦吻合,必然是商王朝要抵御和征伐的主要目标和对象。故殷墟卜辞所记的伐羌、获羌、用羌等内容,主要应与刘家文化相关。

处于泾水中游地区的碾子坡文化,虽可能是古密须国的文化遗存,但其来源与刘家文化有一定的联系,或可被视为羌文化的一支。

正是由于来自不同地区、性质复杂、特征各异的文化在关中的接触、碰撞、融合和

升华，最终导致了凝聚多种文化优势的结晶——西周文明的诞生，把中国早期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

书中涉及了许多比较重要和新颖的研究课题，有些虽可能还不是最终的结论，尚需进一步的检验和证实。但《关中商代文化研究》仍然可以让我们对商、先周、刘家以及碾子坡等文化活动于关中的时间、空间范围，相互关系和商代的周、密须及羌等西土的方国、部族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必能开阔有关研究领域的视野。特别是对夏、商、周历史文化、甲骨学等方面的研究，会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2004年10月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节 渭水流域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构架特点	(2)
第二节 周原遗址殷商时期文化遗存试析	(13)
第一章 关中西部商文化研究	(30)
第一节 引论	(30)
第二节 文化遗存分期和年代	(32)
一、有关遗址的概况和典型层位的分析	(32)
二、陶器及铜器形制分析	(35)
三、文化分期及各期的基本特征	(47)
四、年代的确定	(52)
第三节 文化性质、名称及族属	(56)
一、文化性质	(56)
二、关于名称的问题	(69)
三、族属结构的分析	(72)
第四节 相关问题讨论	(76)
一、京当型商文化兴衰的历史背景	(76)
二、B类因素与先周文化的问题	(80)
三、其他文化因素与相关文化的问题	(90)

第五节 结语	(102)
第二章 关中东部商文化研究	(105)
第一节 引论	(105)
第二节 关中东部商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概况	(107)
一、有关商文化遗存的发现	(107)
二、研究概况	(112)
第三节 文化遗存的分期研究	(115)
一、早商文化的分期	(115)
二、晚商文化的分期	(131)
第四节 关中东部商文化的类型与族属	(146)
一、早商文化的类型	(146)
二、晚商文化的类型	(153)
三、关于族属的问题	(157)
第五节 其他有关问题	(164)
一、商文化在关中东部的发展状况	(164)
二、对其他文化的影响和相互关系	(168)
第六节 结语	(177)
第三章 先周文化研究	(180)
第一节 引论	(180)
第二节 对先周文化的认定	(182)
一、先周文化的含义	(182)
二、先周文化存在地域的历史依据	(183)
三、地层学提供的时间条件	(190)
四、文化内涵的认定	(193)
第三节 文化分期和年代	(197)

一、研究资料的梳理	(197)
二、郑家坡型的分期和年代	(203)
三、孙家型的初步分析	(237)
四、其他先周文化居址、墓地简析	(245)
第四节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及文化来源	(249)
一、与其他青铜文化的关系	(249)
二、关于先周文化的来源	(267)
第五节 结语	(274)
第四章 羌系文化研究	(277)
第一节 刘家文化研究	(277)
一、引论	(277)
二、所使用材料的梳理	(278)
三、文化分期和年代	(282)
四、文化来源及其性质	(306)
五、结语	(317)
第二节 碾子坡文化研究	(319)
一、碾子坡文化的分布及分期	(320)
二、各期年代的推定	(323)
三、与先周文化交汇地域的发现及两者的关系	(326)
四、与其他相邻文化的关系	(328)
五、文化性质的推测	(329)
六、小结	(334)
第三节 殷墟卜辞所记“羌方”的考古学文化观察	(334)
一、晋南、关中地区的商文化发现概况	(335)
二、陕、晋高原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的性质	(337)
三、关中西部其他商代考古学文化与羌族的关系	(339)
四、与羌有关的其他考古学文化简析	(341)
五、小结	(343)

结束语 (344)

后记 (349)

绪 论

在以农耕经济为特色的古代中国，陕西关中地区所独具的优越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长期为封建王朝所青睐，也早为深谋远虑的古代政治家所洞悉。《史记·刘敬传》记载娄敬劝高祖刘邦建都关中说的话，“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及《留侯世家》载张良劝汉高祖从娄敬之说西都关中的议论，“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就是最具典型的代表。

所以，周、秦、汉、唐几个辉煌的封建王朝均建都于西安，遂使关中成为京畿重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建立起了崇高地位，从而不知演绎了多少精彩的历史话剧。正史、野史、稗官杂记等，往往有浓墨重彩的描绘。但受古代文化发展阶段的局限，人们对关中地区西周以前的历史文化状况的了解，却是微乎其微，由于历史文献记录语焉不详，甚至对兴于关中的周民族本身的历史也不大清楚。

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传入和快速的发展，几十年来文物、考古资料有了大量的积累，给了我们重新认识古代文化、文明发展历史的难得机遇。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科学地了解关中地区在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之前的文化变迁和面貌特征的有利条件，可以让我们从考古学的视野考察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特点。而要做好这方面的考察，对处于西周之前的关中地区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关中地区的考古活动^①就进入了中国的学术领域，时至今日，经过了 70 余年，各种目的不同的考古调查、发掘项目已是数以百计，有关商时期的考古工作也逾数十，并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已初步揭开了关中商代考古学文化的神秘面纱。尽管这些工作还不足以完整地重构历史，但已能使我们对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的绚丽多彩，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① 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北平史学研究所，1948 年。

我们将以这些考古资料为基础,以历史文献和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等为参考,从渭水流域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结构特点,和以周原为代表的典型遗址的考古发现中所反映的多种考古学文化变迁的线索入手,对关中地区发展状况基本清楚的商文化、先周文化、刘家文化等进行较具体和全面的分析研究,并就它们对周边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和相互关系进行一些适当的探讨,希望能够更深入地揭示关中商代考古学文化特殊性和复杂性出现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客观地认识西周文明在该地区形成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第一节 渭水流域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构架特点

渭水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以大地湾、北首岭、半坡、福临堡、沪西庄、客省庄等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揭示了该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面貌特征,并初步建立起了文化发展的基本序列和时空框架,同时也成为周边地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参照标准。

随着龙山时代的结束,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却出现了较大的落差。较长时期以来,人们已无法指认客省庄文化的发展去向及后继文化是什么?以至出现了先周文化是在陕西龙山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了齐家文化的一些因素发展起来的等等认识,而把周文化的起源直接与客省庄文化联系在一起。尽管不少学者倾向于客省庄二期文化的下限已进入夏纪年的范围,“周虽旧邦”也表明周人有较悠久的历史,但千余年的时空区间太过遥远,故仍不能消弭人们对上述认识的质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探索周民族起源的热情,有力地推动了先周及渭水流域夏商时期的考古工作,许多新的重要发现,促进了先周文化研究的深入,也使渭水流域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有所揭示,基本改变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之间文化空缺的局面。经过初步的分析研究,可以注意到这一地区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构架的许多突出特点,在许多方面与当地新石器时代和西周以后文化面貌比较单一,外向扩张发展的状况有较明显的不同。

一、文化类型众多,文化面貌丰富多彩

当以二里头文化为标志的夏王朝开启了中原文明的大门时,渭水流域从东到西先后也发生了重大而复杂的文化变迁。到目前为止,有关考古资料表明,除了泾水中、上游的陇东地区以外,渭河中、下游的关中地区,及陇山以西的上游地区,或多或少都发现了可以推断为相当于夏时期的文化遗存。

西安以东至渭河入黄的下游地区,文化变迁的敏感性最高,大约从夏代初期开始,

龙山时代即告结束，客省庄文化被近年辨认出来的一类新的考古学文化——老牛坡类型^① 遗存所取代。

这类以罐类陶器为主体，流行平底器，较少三足器的文化遗存，与客省庄二期文化流行以鬲为炊器，和二里头文化流行以鼎为炊器的现象均有较大的差别。西安老牛坡^② 和近年发掘的商州东龙山遗址^③ 都提供有该遗存晚于客省庄文化的地层关系，并有与二里头文化早期遗物共存的现象，证明其年代相当于二里头一、二期。

这一时间范围内的渭河中游地区，主要包括了西安以西至陇山东麓的关中西部，似乎尚未完全走出龙山时代。在这里能看到一类客省庄文化“双庵类型”的晚期遗存，以麟游县蔡家河遗址 H29^④、千阳望鲁台残灰坑^⑤ 等单位为代表。

这类遗存保存了双庵类型的基本面貌，不同之处主要是陶鬲的比例有所下降，花边口沿的高领罐数量增加，出现了侈口矮领的折肩罐，形成了较为鲜明的文化特征。这些特征在客省庄文化，以及双庵类型中尚没有发现，因此，这类遗存的时代可能要比过去所见的客省庄文化晚一些，而相当于夏代早期。

渭河上游，此时与大多数甘青地区一样，属于晚期齐家文化的势力范围。确切地说，渭河上游地区存在的可能主要是齐家文化“川口河类型”^⑥。

川口河类型与皇娘娘台齐家文化晚期较接近，又有一定的特点。是一类以带耳罐、鼓腹罐为主，缺少三足器的文化遗存，在甘肃东部的一些县区有收藏，但最初发现却是在陕西的陇县川口河村^⑦，相信其已进入关中西部。由于该遗存中可见老牛坡类型陶器，又有与二里头文化二期陶盃相似的器物见于其分布区^⑧，应与该类型有关，是知其年代也相当于夏代早期。

大约到夏代中期以后，渭水流域出现了几类新的考古学文化。

渭河下游以及相邻的丹江上游地区基本上为二里头三、四期文化所覆盖^⑨，存在于

① 张天恩：《试论关中西部夏代文化遗存》，《文博》2000年第3期。

② 刘士莪：《西安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笔者于1996年、1998年先后两次在刘士莪先生处拜读了该报告的手稿。又参见刘士莪：《西安老牛坡龙山文化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西安半坡博物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三秦出版社，1998年。

③ 杨亚长：《陕西夏时期考古的新进展》，《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五期，2000年6月。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000年发掘资料，待刊。

④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陕西麟游县蔡家河遗址龙山遗存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

⑤ 张天恩：《关中西部夏代文化遗存的探索》，《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

⑥ 张天恩等：《川口河齐家文化陶器的新审视》，《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

⑦ 尹盛平：《陕西陇县川口河齐家文化陶器》，《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5期。

⑧ 张天恩：《天水出土的兽面纹铜牌饰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⑨ 张天恩：《试论关中西部夏代文化遗存》，《文博》2000年第3期。杨亚长：《陕西夏时期考古的新进展》，《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五期，2000年6月。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000年发掘资料，待刊。

当地的老牛坡类型文化迅速消亡，去向不明。

渭河中游地区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类以花边罐、花边联裆鬲、高领鬲、折肩罐等陶器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由于尚缺少发掘材料，将之暂称为“望鲁台——乔家堡类型”^①。该类型的陶器在关中西部不少县市可以零星见到，千阳县是调查发现遗址较多的一个地区。

这类文化的一部分因素，是从当地以麟游县蔡家河遗址 H29 等为代表的遗存继承而来，故其年代应晚于后者，而可能相当于夏代中、晚期或略晚。

在渭河上游地区，还没有可以认定晚到这一时期的齐家文化（包括川口河类型）。但发现有一类以饰蛇纹（棱形细堆纹）的高领罐、高领鬲等陶器为代表的遗存，见于渭河支流葫芦河流域的庄浪县刘堡坪，和齐家文化的冠名遗址，洮河流域的广河县齐家坪，我称之为“刘堡坪类型”^②。

刘堡坪类型的分布区与齐家文化有部分重合，但众多的齐家文化遗址中从未发现过其信息，可见其必晚无疑。夏代晚期出现在北方地区的蛇纹陶器，商代早期的渭河中、上游地区刘家文化早期遗存，均有继承这类文化的线索，其存在的时间定不晚于前两者。因此，其时代范围很可能相当于夏代晚期或稍后。

汤灭夏桀，导致了中原地区早商文化迅速取代了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学变化，渭水流域诸文化由于历史背景、文化渊源、经济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也以不同的速率逐步地发生着分化变迁，从而使此区商代的考古学文化显得更加丰富多彩。自河口至于渭源，先后有多种考古学文化登上这一地区的历史舞台。

首先，商文化的覆盖区直抵现在的西安附近。在渭北的大荔赵庄、白村^③，耀县北村^④，渭河以南的华县南沙村^⑤，西安老牛坡^⑥等遗址，都发现了比较典型的二里冈期早商文化遗存。

二里冈上层时期，商文化又向西推进到渭河中游的周原地区，形成了“京当型”商文化^⑦，约持续到殷墟二期阶段，商文化开始从该地区退出。

在渭河中游地区，与京当型商文化相邻的主要有先周文化（包括郑家坡类型和孙家

① 张天恩：《关中西部夏代文化遗存的探索》，《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

② 张天恩：《关中西部夏代文化遗存的探索》，《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

③ 西安半坡博物馆发掘资料，待刊。参见本书第一章。

④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等：《陕西耀县北村遗址1984年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⑤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⑥ 宋新潮：《试论老牛坡商文化分期》，西北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1987年5月，复印稿。

⑦ a.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b. 西安半坡博物馆发掘资料，待刊。参见本书第一章。

类型)、刘家文化和碾子坡文化。

先周文化早期分布于漆水河流域至泾河中游局部的地方^①,偏南部与京当型商文化似有交错相处的现象,到晚期几乎占据了整个泾渭地区。

刘家文化^②是一类流行高领袋足鬲、高领鼓腹罐等陶器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分布区相当广泛,包括了周原以西的宝鸡地区和陇山以西的渭河上游大部分,与京当型商文化相邻而处过较长的时期。

碾子坡文化^③的面貌,包括了先周和刘家文化的部分特征,分布区主要在泾河中游的支流黑河流域,晚期进入了漆水河的上游地区。

这几支文化除了碾子坡的上限约在殷墟一期外,其余都可达二里冈上层时期,而刘家文化的上限可能还要略早一些,下限基本上均可到商末。

渭河上游的西端,还有一类以流行黑色彩绘,带耳的高领鼓腹圜底罐、圜底钵等为代表的董家台类型,被认为分布区自河西走廊东端至于渭源及附近地区,年代约在商代前期^④。

环泾渭地区西北边缘地带而分布的寺洼文化,向西可达洮河流域,面貌比较独特,时间范围约从商代后期或略早出现,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

二、结构复杂,谱系繁多

众多的考古学文化以不同的面貌特征,在夏商时期出现于渭水流域,形成了复杂的文化结构,究其原因,是由于不同地区不同谱系的文化曾先后进入这一区域,与当地的文化发生了交流、影响、融合、变革、发展所导致的结果。

渭河下游地区的老牛坡类型,虽是近年才识别出来的夏代早期遗存,但属于该类型的墓葬和陶器却早有发现。1958年修建三门峡水库时,在华阴县横镇遗址发掘的一座龙山晚期长方形竖穴墓,为男女合葬,头西足东,编号M9。随葬品6件,为单耳罐和双耳罐^⑤,正是这类遗存的首次面世。

20世纪80年代,蓝田县泄湖遗址^⑥和西安老牛坡遗址的发掘,进一步丰富了我们

① a. 尹盛平等:《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文物》1984年第7期。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队:《陕西彬县断泾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2期。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1994年在旬邑孙家遗址的发掘资料,待刊。

② 尹盛平等:《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文物》1984年第7期。

③ 张天恩:《碾子坡文化的初步认识》,《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陕西省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④ 李水成:《论董家台类型及相关问题》,《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横镇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四辑,1984年。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六队:《陕西蓝田泄湖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第4期。

这类文化遗存的认识。特别是后一地点的发掘工作,发现了多座墓葬和灰坑,出土了数量颇丰的陶器和石器^①,使我们能较为清楚地了解到,其文化面貌有极为明显的独立性。

从单耳罐、花边罐、三耳杯、双耳杯等陶器,不难看出其有从客省庄文化继承发展的线索。但从全貌分析,却很难说是后者的自然发展延续,而有受到东、西部两方面文化强烈影响的证据。

其中的陶觚、圜底罐、高领鬲等不见于客省庄文化,应是受到河洛地区二里头文化及东下冯类型影响的产物。墓葬中发现有随葬多件玉、石璧的习俗,存在男女合葬墓,以及颈部极高,腹部较浅的双耳杯等陶器,都具有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浓烈特征,与皇娘娘台齐家文化晚期墓葬更有着惊人的相似^②。因此,东、西两侧文化的共同影响,在客省庄文化向老牛坡类型蜕变过程中的作用绝不能低估。

过去,曾有将客省庄文化的消亡,与“启伐有户氏”的历史记载相联系的认识,但少有信从者。正值中原地区出现二里头文化之时,恰在相邻的渭河下游也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文化更替现象,而这一现象又与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有内在的联系,确实值得进一步深思。

客省庄文化在渭河下游被老牛坡类型取代的现象,似乎在渭河中游地区并没有出现,存在于这里的是以麟游县蔡家河 H29 等单位为代表的客省庄文化双庵类型晚期遗存。那么,后者应是老牛坡类型时代相当的考古学文化,该文化保存了双庵类型的基本面貌,说明其性质还没有变化。这一事实反映的则可能是,客省庄文化晚期遗存在渭河中游地区有滞后现象。

也就是说,夏代初期发生在渭河下游的文化变革,并没有在中游地区产生直接的、重大的影响。

川口河类型,是分布在渭河上游偏东地区齐家文化晚期遗存,以罐为主,保持了齐家文化的特色。甘肃天水师赵、西山坪^③,宁夏隆德页河子^④刊布的材料,增加了齐家文化是客省庄文化向西发展而来理论的说服力,更正确的说法应当是由双庵类型发展演变而来。但齐家文化形成后则渐与后者有了较大的差别,而成为西北地区一支极富张力的文化体系,对周邻文化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在其后期又出现了东向关中的势力扩张,陇县川口河等地发现的齐家文化晚期墓葬就是很好的证明。

一般认为齐家文化的年代下限可能已落在夏代的纪年范围,但除了碳-14 年代数

① 刘士莪:《西安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

②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 年第 4 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与西山坪》,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④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隆德页河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 年。